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樊克政
编

龚自珍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樊克政
编

龚自珍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樊克政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300-20925-8

I. ①中… II. ①樊…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龚自珍 (1792~184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214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龚自珍卷

樊克政 编

Gong Zizhe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3.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38 000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 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龚自珍是我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的杰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与诗人。以他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序曲。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是中国思想发展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从而“揭开我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页”（王元化：《龚自珍思想笔谈》，见《清园论学集》，2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的重要历史地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璚人，一字尔玉，号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日（1792年8月22日），他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的一户宦宦之家。祖父龚敬身，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郎中、云南楚雄知府等。著有《桂隐山房遗稿》。父亲丽正，于嘉庆元年（1796），亦即龚自珍5岁那年中进士，由礼部主事历官至江苏苏松太兵备道。他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是著名朴学家、以《说文解字注》一书名世的段玉裁的学术传人之一，著有《三礼图考》、《国语补注》、《楚辞名物考》等。母亲段驯，也熟读诗书，富有才学，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不言而喻，龚自珍自幼就深受浓郁的学术与文学气氛的熏陶。

嘉庆二年（1797），龚自珍6岁那年夏天，随母亲离开南方，入京同父亲一起生活。此后的十五年间，除了因祖父去世，父亲回乡服丧，他也曾有不到两年的时光，一度返回南方以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北京度

过的。这段时间里，在得天独厚的家庭教育的引导下，他广泛接触经史、文字、官制、目录、金石等项学问，这些都体现出，身为朴学家的外祖父与父亲的治学路径，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沿着这条道路亦步亦趋地走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国势由盛转衰的时期。吏治败坏、财政拮据、军备废弛的状况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渐趋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是爆发于他5岁那年（嘉庆元年，1796），历时9年之久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明显地透露出清王朝业已江河日下、颓势难挽的信息。与此同时，中国遭受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危险也不断加重。进入嘉庆朝后，英国对华的军事威胁逐渐加剧。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龚自珍很早就萌生出对时代与国家命运的隐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他16岁到18岁，即嘉庆十二年（1807）至嘉庆十四年（1809）间，他还结识了丁履恒、王昙等忘年交，丁氏“志欲有为于世”（张际亮《丁若士先生墓志铭》，《张亨甫文集》卷四），“尝讲求农田、水利、钱法、盐政、兵刑，皆有论说”（同上）。王氏于国计民生也很留心，“好谈经济，尤喜论兵”（陈文述《王仲瞿墓志》，《碑传集》卷四十七）。龚自珍与他们的交往，对于促进其经世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对有关时政边务、国计民生等问题的思考，在他的头脑里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据他后来回忆，早在嘉庆十四五年（1809—1810），亦即他“十八九”岁时，他便开始“执笔道天下事”（《送歙吴君序》）了。

也就在19岁那年秋天，龚自珍参加顺天乡试，考取了副贡生。一年多以后的嘉庆十七年（1812）初，他的父亲在做了多年礼部官员与军机章京后，被外放安徽徽州知府。后调任安庆知府。嘉庆二十一年（1816）春，又升任驻地在上海的江苏苏松太兵备道。这几年，他随父相继辗转于这几处地方。其间，他除了因参加顺天乡试，去过北京以外，也还去过家乡杭州与外祖父居住的苏州。这样，他就得以较为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现实。而随父侍任的生活，则还使他得以了解到地方官场的实情。这些都促使他的忧患意识愈加强烈了。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嘉庆十八年（1813）京畿天理教徒突袭皇宫失败与嘉庆皇帝随之发表《遇变罪己诏》等谕旨以后，龚自珍就写了著名的《明良论》四篇。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1816）间，又写了《乙丙之际箸（塾）议》多篇。此外，这几年里，他还写过《平均

篇》等。他所撰写的这一批属于评议时政、经邦济世性质的文章，无疑意味着，他已踏上了一条与父、祖辈不同的议政道路。

嘉庆二十三年（1818），龚自珍参加浙江乡试，考中举人。此后两年，他先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但均未考取。于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会试后，他捐了一名内阁中书，并于道光元年（1821）正式到内阁就职。

这几年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在京期间，曾从著名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逢禄问学，“受《公羊春秋》”（《己亥杂诗》第五九首自注）。《公羊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典籍之一。以注重阐发儒家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特别是《春秋公羊传》义理为特色，注重“通经致用”（皮锡瑞：《经学历史》，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的今文经学，作为与古文经学相对峙的一大经学流派，自东汉末年以降，久已沉寂。乾隆时，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起而重新研究《公羊》义理，开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先河。作为他的外孙的刘逢禄，发扬光大了他的事业。刘氏“尤精《春秋》公羊家言”（金武祥《粟香随笔》卷五），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等书，阐发“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公羊》义理。由于他的努力，常州学派这一以推尊《公羊》为显著特征的清代今文经学派（又称公羊学派）得以真正确立。所以，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显然是他正式师承常州学派公羊学的标志。

不过，龚自珍接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并不自嘉庆二十四年始。他在此之前所写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曾借鉴过公羊学的三世说，说明他那时对公羊学就已有了一些了解。而在嘉庆二十四年以后，他所写的阐述其经济改革思想的《农宗》，以及《五经大义终始论》、《古史钩沉论》等多篇文章中，更可看到他对公羊家言的一再引用和发挥。这些文章都无疑是他的经世思想与今文经学相结合的思想结晶。

在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嘉庆二十四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不仅是他正式学习今文经学的肇端之年，也是他撰写学佛习儒手记——《珠镜吉祥龕心课》的起始之年（参见《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彩色图版·四四 龚自珍行书珠镜吉祥龕心课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嘉庆二十四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19—1820）间，他还写了阐述自己关于西北边政问题见解的两篇重要文章——《上

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西域置行省议》。此外，也是自嘉庆二十四年前后始，他还着手从事《蒙古图志》的撰写。这是他本人十分看重的一项工作，他的计划是，“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当这部书稿写出十之五六时，道光二年（1822）九月，龚自珍上海家中的书楼突发火灾，“此书稿本之半，及为此书而收聚之档册图志，世所弗恒见者，尽毁”（同上文所附自记），于是他只好“辍业弗为”（同上）。这不仅是他个人学术事业中的一大憾事，也是当时边疆史地之学的一大损失。

尽管如此，通过从事此项工作，毕竟使他对中国北部边疆以及与之相关的西北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的知识素养更加丰富。而正是凭借这种素养，他在道光初年入内阁后，被派充任国史馆校对官期间，还曾上书国史馆总裁等，对正在纂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如何在涉及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地区的记载方面，填补旧《一统志》（即乾隆《大清一统志》）的遗漏，订正其谬误，并充实新内容等，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此后，道光三年（1823）秋，他因母亲去世回南方服丧。道光六年（1826）春返京。同年，再次参加会试，仍未考中。直到道光九年（1829），他又一次参加会试，才终于考取进士。其时，他曾被授以知县，经他呈请后，仍任内阁中书。由于这年会试的一年多以前，清政府平定了张格尔在南疆从事的叛乱活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一直延续到会试当年，所以会试之后紧接着举行的“殿上三试”中，不仅殿试的策问试题，问及历代筹边之策是否有可采之处，而且朝考的题目也有“安边绥远疏”。在为这两次考试所分别撰写的《对策》与《御试安边绥远疏》中，龚自珍又一再就边政问题建言献策，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从道光六年再次到京至道光十八年（1838），龚自珍先后所任的官职有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与礼部主事。由于长期担任这类闲职，他得以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学术创作活动，主要经学成果有：

道光八年（1828），他撰成《大誓答问》一卷，刘逢禄曾为该书作序（四年后，该书初刻于杭州）。同年又撰成《尚书序大义》一卷、《尚书马氏家法》一卷（已佚）。

道光十二年（1832），他撰成《群经写官答问》（已佚）。

道光十三年（1833），他撰成《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左氏决疣》一卷，又在朱以升协助下，撰成《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考》一卷

(均佚)。又撰有《六经正名》与《六经正名答问》五篇。

道光十八年(1838)前后,他撰成《春秋决事比》六卷。该书的撰写历时近三年,内分十篇,第一—十篇所引经传一百二十事已佚,其余部分,即第六—十篇分别所附的答问共四十事与《春秋决事比自序》、《春秋决事比目录》尚存,被合为一卷,刻入《皇清经解续编》。

此外,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间,他还撰成《吉金款识》十二卷(部分内容以“龚定盦云”、“龚曰”等形式,明确见于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等书)。

在此同时,除了西北边务外,他仍密切关注着事关国计民生的其他问题。面对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愈来愈严重的鸦片走私与东南海疆的安危问题,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写的《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与《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以及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839年1月5日)前后所写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一再明确表达了自己力主禁烟与反抗英国侵略的坚定态度。不仅如此,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受命离京赴粤查禁鸦片临行之前,他还曾致函表示愿相随南下,予以相助。只是由于林则徐考虑到禁烟斗争不会一帆风顺,出于对他的爱护之心,托人代为婉言劝阻,他才未能一同前往。

也是在道光十八年,他因与上司发生齟齬,加之,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一再指陈时弊,呼吁改革,因而引起封建权贵的嫉恨,长期“困阨下僚”(《跋某帖后》),备受排斥、压抑,所以决意不再为官,乃以父亲年过七十,需要终养为由,提出辞官之请。不过,此事进行得并不顺利。至迟在同年七月,他的当年返乡计划已经落空。九月末,由于他的叔父龚守正被命署理礼部尚书,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依照清朝的有关规定,他被谕令开缺回避。按理说,他的离京问题缘此已获解决。不过由于“负债京师”(《邓太恭人八旬寿序》),一直拖到次年,才得以成行。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只身踏上了南返故乡的途程。七月上旬,回到杭州。九月中旬,他又北上迎接在京的眷属,于春节前将眷属接回,安顿于江苏昆山。这一年南北往返途中,他一共写作七绝三百十五首,统题《己亥杂诗》。

道光二十年(1840),他曾到苏州、南京一带游历。是年所写词作辑为《庚子雅词》。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他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前往丹阳，主持云阳书院讲席。闰三月，父亲去世后，他又继任其杭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

同年七月，侵华英军自香港北上，攻陷厦门，并继续北犯。江浙沿海形势骤然吃紧。这时，龚自珍的故人、刚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受命于八月初一日抵达上海，筹办防御事宜。龚自珍闻讯后，认为这是自己投身抗英斗争的大好机会。于是，当即写信给他，“论时事”（梁章钜《师友集》卷六），并与之相约，立即辞去书院教席，前赴上海，加入梁的幕府，以“助筹笔”（同上）。正当梁在上海翘首期盼龚自珍前来，“扫榻以待”（同上）时，他却不幸于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因病暴卒于丹阳县县署。

二

侯外庐先生曾将龚自珍誉为“时代的号筒”（侯外庐：《论龚自珍思想》，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册，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堪称对龚自珍思想十分精当的概括。

“时代的号筒”也者，时代的代言人也。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我们看到，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亦即中国行将发生“三千年馀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前夜度过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龚自珍以他思想家独具的深沉与诗人特有的锐敏，紧扣时代的脉搏，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龚自珍思想最令时人感到发聋振聩的，是他的社会批评论。

与当时充斥朝野的一片粉饰太平、“河清海晏”之声截然相反，他大胆披露出中国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严重社会危机。他尖锐地揭示说，这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一议。”（《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这个“衰世”中，不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而且“巷无才偷……藪泽无才盗”（同上）。一旦有“才士与才民出”，他们就会遭到“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

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同上）。在如此淋漓尽致地暴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这是一个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时代：“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还把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比做患了“痺痹之疾”的病人，说它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已到了犹如“日之将夕”（《尊隐》），奄奄待毙的境地。并揭露说，沉重的赋税负担已将农民群众逼上“屠牛那不胜栽禾”（《己亥杂诗》第一二三首）的绝路。他由此认为，“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并在《尊隐》一文中声言：将会有一种所谓“山中之民”的社会力量，掀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狂潮。联想到他去世后未及十年所爆发的那场席卷中国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人们不能不感叹他对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过人的敏感。

与此同时，他还抨击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一方面，他痛斥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庸碌无能，“尽奄然而无有生气”（《明良论三》），并揭露了他们的寡廉鲜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明良论二》）并指斥朝中政要将国计民生丢在一边，一味追求享受和逢迎讨好皇帝：“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同上）另一方面，他还对当时各级政府中，专司“书狱”即办理刑事案件的胥吏，上下串通，勾结官员，行私舞弊的劣迹，作了猛烈的抨击。痛斥他们：“豺踞而鸱视，蔓引而蝇孳”，“挟百执事而颠倒下上”（《乙丙之际塾议三》），从而将封建官僚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于世人。

不仅如此，他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尖锐指出，这种制度使“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明良论四》）。还大胆指责封建帝王“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古史钩沉论一》），“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同上），并认为这是造成官僚集团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龚自珍思想最能反映其经世之志的，是他的更法改革论。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龚自珍极力呼吁变法改革。他强调指出：

“一祖之法无不敝”（《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并认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陟”，势必导致“踵兴者之改图”（同上）。因此，他向封建统治者建言：“奈之何不思更法”（《明良论四》），“与其赠来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又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上大学士书》），肯定变法改革是古今社会发展的通则。

由此出发，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改革建议：

政治方面，他主张君臣“坐而论道”（《明良论二》），变君臣之间的主仆关系为主宾关系，并改革“用人论资格”的制度。他还强烈呼吁废除以四书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拟厘正五事书》），建议“改功令，以收真才”（同上）。

经济方面，他认为“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平均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贫富“大不相齐”（《平均篇》）必将导致封建王朝覆亡。所以，他在《平均篇》中，一方面表达了“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另一方面他所实际提出的主张是，“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即君、臣、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应依照封建等级，各取其应得之份，防止“勺者下侵”、“卮者上侵”，以避免使之发展到贫富“大不相齐”的地步。后来，他在《农宗》一文中，还提出了依照封建宗法组织授田的具体改革方案——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重新分配土地：大宗授田百亩；小宗、群宗分别授田二十五亩；闲民不授田，为大宗、小宗、群宗从事耕种——以试图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流民问题。

龚自珍思想最能体现其家国情怀的，是他的安边保疆论。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曾在《明良论二》中表述过，自己对“封疆万分之一有缓急”时，官员们能否真正为国分忧，共赴国难的隐忧，从而表现出，他对国家安危的高度重视。

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边务问题一直十分留意。嘉庆末年，他在所撰《西域置行省议》中，明确提出了迁徙“内地无产之民”去新疆从事垦殖，并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巩固西北边防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致信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兴，强调指出：“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即是说，保持天山南路（又称